

論沈從文的北京書寫

郝譽翔*

【摘要】

在沈從文作品中，以都市為題材的小說份量幾乎與鄉土相當，「鄉土」與「都市」可說是沈從文同時擁有的兩副臉孔、兩種聲音，矛盾並存在他的作品裡。故本文從沈從文的北京生活和書寫入手，分析北京如何刺激並從而創造他的湘西想像。「會館」是沈從文初到北京的住處，後來遷到北大沙灘附近的「公寓」，而從「會館」到「公寓」正代表1920了年代知識份子形象的轉變，「會館」的書生變成了「公寓」的「浪人」。而身處在軍閥統治之下的北京，國家、道德倫理秩序皆發生了嚴重的危機，故沈從文的北京書寫充滿了虛無的無政府色彩，以酷語、色語和穢語，刻畫食色的慾望、情愛的過度消耗，和精神上的狂躁，也瓦解了國家話語的義正嚴詞。沈從文要從人的惡德和原欲中去找尋美，並將這種美的追求，投射到他回憶之中的湘西故鄉，以抒解現實之中的焦慮緊張。直到最後，他在有著帝國深厚傳統底蘊的北京，才終於找尋到一平

* 國立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衡「現實」與「幻念」的美，並以此作為一個二十世紀個人主義者的終極救贖。

關鍵詞：北京、都市書寫、沈從文、現代小說、湘西

一、沒有「北京」，何來「湘西」？

歷來關於沈從文的研究，大多是著重在他作品中所展現的牧歌或田園詩般的抒情特質，而把他定義成一位鄉土寫實作家，或是擅長描寫景色神髓的印象主義者¹。誠然，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世界確實獨樹一幟，不過，若是檢閱他的全部著作，則以都市為題材的小說份量幾乎是與鄉土相庭抗禮，難分軒輊²。尤其是在寫作階段的第一個十年中間，從1925年開始，沈從文在北京《晨報》上發表作品，直到1934年出版《邊城》為止，在他的小說中卻竟幾乎有三分之二以上，皆是以都市的中上階級作為描寫的對象。

不止如此，更值得注意的是，沈從文對於都市生活的關注和捕捉，並不因為湘西之作如《邊城》或《湘行散記》等等的成功，而宣告終止，相反的，他持續地書寫都市，譬如《八駿圖》、《主婦集》、《新與舊》等集之中，皆不乏此類作品。而且有趣的是，在對面湘西以及都市生活這兩種截然相反的題材時，沈從文也似乎在有意或無意之間，採取了不同的寫作策略。王德威曾經指出，若是以中國現代小說的抒情特質而言，沈從文和五四作家最大的不同，就在於他不耽溺於主觀的情緒，而改出之以節制含蓄的詩意³。不過，這一點特質似乎也只有展現在他的湘西書寫之中，譬如《邊城》所刻意營造出的、曖昧朦朧的時空距離，而使得全篇充滿了哀而不傷的溫婉與寧靜。然而，當沈從文轉過身去描寫

¹ 如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2）第八章中以「牧歌式文體」稱呼沈從文小說，並讚譽他的「寫實的才華」，是中國現代文學中最偉大的「印象主義者」。

² 在《沈從文文集》中的小說，有七十六篇以城市為主題，八十七篇以鄉村為主題。見王潤華，《沈從文小說理論與作品新論》（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頁87。

³ 見David Wang, *Fictional Realism in 20th-Century China: Mao Dun, Lao She, Shen Congw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05.

現代都市生活時，卻是流露出了截然不同的氣質，他多半緊扣時下社會的脈動，或是刻畫公寓生活的處境，或是捕捉民國以來仕紳階級和知識份子的形象，或是辯證中國未來的前途，皆往往是與他生活經驗的轉折，緊密地扣合一起，而且具有濃厚的自傳和自白性質，主觀情緒也相形強烈，與郁達夫、郭沫若等人的風格可以說是絕相類似。換言之，「故鄉」與「都市」就彷彿是沈從文同時擁有的兩副臉孔，兩種聲音，兩條旋律；一是屬於「過去」，一是屬於「現在」，而兩者竟一直以複格的曲式般，在沈從文的生命之中並存、交響、共鳴。

我們又要如何解釋這種「故鄉」與「都市」的二元對立、矛盾與共生呢？而這又彰顯出了什麼意義？我以為，若只是單看沈從文的鄉土小說，恐怕並不能妥切地掌握這個作家的文學核心，因為在他的創作歷程之中，「故鄉」與「都市」、「過去」與「現在」、「回憶」與「此刻」始終相互伴隨，也因此若要瞭解沈從文的鄉土，非得要參照這些都市書寫的作品不可。後者不僅在沈從文的著作中佔有極大的比重，更能夠說明他在面對時代遽變之時，內心所開展的一條迂迴周折的歷程。事實上，自從1922年沈從文受到五四新文學運動感召，而離開湘西故土後，他就一直是居住在都市之中，輾轉於北京、上海、青島、昆明等地，而其中，尤其是以北京這一座都市最為重要。北京不但是沈從文寫作生涯的起點，更是他一生中生活最久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在三〇年代爆發「京派」與「海派」之爭時，他不僅領頭論戰，甚至還成為「京派」作家群中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故在沈從文的身上，這兩個擁有巨大反差與對比的世界——一是代表中國「主流」士大夫傳統的「京派」，一則是出之於「邊陲」蠻夷的湘西「鄉土」，竟然是奇異地融合在一起了。而我以為，從此一角度出發探索，或將更能夠解答沈從文何以走出一條與三〇年代左翼文學截然不同的鄉土路線？也將更能夠幫助我們確切地把握，沈從文又是如何將「主流」與「邊陲」這兩股文化揉絞成為一辯？並進一步將中國的抒情傳統灌注入現代小說之中？

就象徵意義而言，在沈從文的創作生涯裡，北京正是一座聯繫起中國「京派」與「鄉土」、「主流」與「邊陲」，乃至「傳統」與「現代」的橋樑。正如同沈從文不斷自稱自己是「鄉下人」一樣，如果不是置身在都市，又何以對照出他「鄉下人」身份的格格不入呢？而若不是置身在繁華的北京大都，又何以令他興起一股濃濃的邊陲鄉愁？故沒有「北京」，何來「湘西」？沈從文自己便曾經把北京比喻成是《邊城》中的一艘渡船，帶領著他與讀者，共同划向了沈澱在記憶與幻想深處的美麗故鄉：

到了北平新環境中，和這一切離遠了，即這種痛苦回憶，竟也成為我生存的最大快樂和支柱了。這個發展既醞釀於成熟的生命中，自然會同時影響到後來的寫作生活，一看即顯然的。作品中的鄉土情感，混合真實和幻念，而把現實生活痛苦印象一部份加以掩飾，使之保留童話的美和靜，也即由之而來。歷來批評者對於這一點，都忽略了作者生命經驗的連續性和不可分割性。唯有一個劉西渭稍得其解也還不夠。……⁴

「北京」遂成為他啟動「湘西」回憶的敘事關鍵，而沈從文之所以屢屢把湘西描繪成一個「保留童話的美和靜」的世界，更是與他的北京經驗息息相關——那是「混合真實和幻念，而把現實生活痛苦印象一部份加以掩飾」的結果。由此亦可得知，對沈從文而言，湘西書寫之偏重田園靜美，而非湘西之貧窮或兵亂，實乃因為在北京孤獨、疏離的異鄉寂寞所致。換言之，是「北京」經驗才從而塑造了沈從文筆下靜美恬適的「湘西」。故在這一篇相當珍貴、卻鮮少有人提及的〈一個人的自白〉文中，沈從文坦白道出，《邊城》中爺爺的形象其實並不是來自於湘西，而是北京西城中「一個每到黃昏即搖鈴鐺串街賣煤油的老頭子」。

當沈從文寫下這篇文章時，正值1949年，國內政局丕變之際，多重

⁴ 沈從文，〈一個人的自白〉，《沈從文全集》第二十七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頁14。

的人事壓力和接踵而至的思想批判，再再逼使他精神崩潰，數度自殺沒有成功之後，他被送入北京的精神病院，遂寫下了這一篇短文，以白心境。1949年，可以說是沈從文一生中最為鬱結狂躁的歲月，他不斷試圖回顧自己以湘西作為題材的小說，好尋求心靈的歸屬與慰藉。譬如在〈丈夫〉的題記下他寫道：

我應當和這些人生命長在一處，移植入人事複雜之大都市，當然毀碎於一種病的發展之中。⁵

與世隔絕、安靜單純的「湘西」，與政爭頻繁、喧囂擾攘的「北京」，竟在他生命中最為困頓的時刻，成為心底來回擺盪、矛盾掙扎的兩極。而在此同時，沈從文更寫下了另一篇今日讀來怵目驚心的文章，描述北京的瘋狂與毀滅：

北平似乎全靜下來了，十分奇怪。不大和平時相近。遠處似聞有鼓聲連續。我難道又起始瘋狂？……我在毀滅我自己。什麼是我？我在何處？我要什麼？我有什麼不愉快？我碰著了什麼事？想不清楚。

……

夜靜得離奇。端午快來了，家鄉中一定是還有龍船下河。翠翠，翠翠，你是在一〇四小房間中酣睡，還是在杜鵑聲中想起我，在我死去以後還想起我？翠翠，三三，我難道又瘋狂了？⁶

妻子張兆和與《邊城》中「翠翠」的形象疊合在一起，彷彿是湘西故土對於漂泊遊子的聲聲召喚。遙遠而溫暖的昔日，再對應於今日充滿肅殺氣氛的北京城，形成了虛實難辨的分裂以及拉扯。而全文破碎凌亂的語句，更是讓人不禁要聯想起魯迅的《狂人日記》，只是這一回，它再也不是虛構的小說創作了，而是一個作家血肉真實的生命情境。如此看來，北京城似乎造就了沈從文，但卻也毀滅了他，而始終維繫生存、給

⁵ 沈從文，《沈從文家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頁150。

⁶ 同前註，頁153-154。

予安慰的，才是一直存在於他心靈深處的「湘西」。不過，弔詭的是，沈從文卻畢竟沒有回到他鍾愛的故鄉，相反的，他選擇繼續留在北京，甚至終於找到了一個與它和平共處之道，一直到1988年生命的最後一刻，他在北京的歲月累積起來，絕對是要遠大過於湘西。也因此，過去關於沈從文的研究，大多著重在湘西部分而不提他的北京經驗，難免缺憾，也忽略了在沈從文的筆下，「北京」與「湘西」多是二元對立甚而並立的存在。故本文以下將要重新回到沈從文創作的起點，解讀他進入北京這一座都市時所體會到的現代經驗，如何刺激並從而創造了他所特有的「湘西」想像？而都市和鄉村又是如何矛盾地共存、共生，並成為中國文人在跨越大時代轉折之際，一條突破生命關隘的出路？

二、北京浪人：從「會館」到「公寓」

1922年，年僅二十歲的沈從文第一次離開湖南，踏入北京這座都市。當時的北京，是在中國僅次於上海的第二大都市，不過，它有別於商業氣息濃重的上海，而更能夠吸引全國的青年前來朝聖的原因，乃是源自於五四運動的影響，早已經如同漣漪一般散佈到各個偏遠的鄉鎮去。雖然在1920年代以後，五四的思潮便已然沒落、轉型，甚至消失，但是它帶給青年最大的遺產，莫過於創造出想像中的文化北京，於是乎有了所謂的「後五四世代」——出生於1900年左右的一代知識青年⁷，在

⁷ 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曾經指出，我們應該要從世代之間的變動來觀察五四，方能夠從中解讀出新的意涵，至於所謂的「五四世代」則是包括了「老師一代」：出生於1880-1895年之間者，譬如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以及「學生一代」：出生於1895到1905年之間者，譬如徐志摩、傅斯年、羅家倫等人，見史華慈著，周陽山節譯，〈五四的回顧——五四運動五十週年討論集導言〉〈五四的回顧——五四運動五十週年討論集導言〉，載於周陽山編，《五四與中國》（臺北：時報出版社，1990），頁273-274對五四世代

家鄉藉由閱讀《新青年》、《創造》、《小說月報》等刊物，受到五四思潮的感召，便各自展開了一段起點不同、但是終點一致的旅程，奔向了共同的夢想與目標：北京，而五四運動的核心陣地：北京大學、燕京大學等，更是他們旅程終點中的終點。正如郁達夫寫給沈從文的信裡所言：「吸引你上北京來的，是一個國立大學畢業生的頭銜。」⁸這句話雖然語帶譏諷，但卻也說明了五四運動在二〇年代初期所造成的餘緒和浪潮，一時之間，竟促成了北京大學和文化事業的繁榮光景，這一繁榮光景約莫維持十年左右，便在1928年之後，因為政治因素而轉移到了新的陣地：上海。

沈從文正是當年離鄉赴京的青年隊伍其中之一，也成為了「後五四世代」中的佼佼者。當他剛抵達北京時，首先是居住在湖南會館，亦即位在楊梅竹斜街的酉陽會館，距離魯迅在五四運動之際居住的紹興會館並不遠。這些會館乃是明清兩代各地世子赴北京趕考時，居住溫書的地方，故多集中在前門、崇文門、宣武門和琉璃廠一帶⁹，距離科舉的考場最近，也因此形成了北京重要的文化圈，直到二十世紀初年，仍然是知識青年來到北京時最重要的落腳地。不過，隨著新的國號紀元來臨，科舉取消，會館早就不復昔日盛況，而淪為一些窮途末日的異鄉人盤據在此，最終貧病老死之處。沈從文形容酉陽會館的情景：

會館裡四合院，住的同鄉有卸職候差的科長，報考落第的窮學生，退伍的小軍官，領少額乾薪的掛名部員。夜裡到處房中都有咳嗽聲，從聲音中即可辨別得出有多少是老病。¹⁰

的討論。

⁸ 見郁達夫，〈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晨報副刊》，1924年11月16日一文。

⁹ 見侯仁之，《北京城市歷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頁191-192，指出會館在明清時期的興盛與變化，因為貢院在東單牌樓、殿試在紫禁城內的保和殿，它的位置也就決定了會館的分布，而它的建築也是以四合院為主。

¹⁰ 見沈從文，〈一個人的自白〉，《沈從文全集》第二十七卷，頁13。

這和魯迅所言的S會館，竟是一般的蕭索淒涼，也是一個注定走向消逝和死亡的封閉所在。「會館」——一座沒落又破敗的傳統「四合院」建築，就彷彿是魯迅所言的「鐵屋子」似的，至此儼然變成了故鄉的隱喻和象徵。在魯迅的創作生涯之中，「會館」始終是一道揮之不去的陰霾，終其一生都被困鎖的原罪，甚至由此指向了令他愛恨交織的故鄉：紹興。不過到了「後五四世代」，這種情況卻已然出現了微妙的變化，以沈從文為例，很快地，他便從「會館」／「故鄉」的枷鎖中脫身，因為那決不是他心目中所嚮往追求的、充滿了五四新青年蓬勃朝氣的北京。在酉陽會館居住沒多久後，他便在表弟黃村生的安排之下，遷往了北大沙灘附近的銀閘胡同公寓¹¹。

從分布在宣武門、琉璃廠一帶，提供世子進京赴考的「會館」，到環繞北大沙灘一帶的「公寓」，這一遷徙和轉換可以說是饒負意味，不但說明了「會館」／「故鄉」已對「後五四世代」產生不同的意義——以「鄉土」作為連結的人際關係樞紐更形淡薄了；而從昔日的科舉，到今日的大學，更是代表著這一批出生於二十世紀初年新世代的心靈活動乃是以北大，也就是現代大學為中心來開展。只是在二〇年代軍閥統治底下的北京，此一大學相形顯得更加自由、鬆散，不論是教學、行政體系或學生，都出現了某種程度的荒弛和混亂¹²。至於所謂的「公寓」生活，則是為這些青年帶來了一種全新的生活經驗和文化型態。

北京「公寓」，乃是自從1911年滿清覆亡後，北京陷入軍閥連年的戰亂，中央權力式微，導致財政上的困窘，而尤其國民軍政府在廣州成

¹¹ 見沈從文〈回憶黃村生〉（《沈從文全集》第二十七卷，頁418-428）與〈憶翔鶴〉（《沈從文全集》第十二卷，頁252-259）二文，提及表弟黃村生為農業大學學生，見他在會館寂寞，故特為他安排公寓，並介紹新環境中的文化和文化人。

¹² 如林幸平以「唯剛」為筆名在《晨報副刊》1925年5月3日發表〈大學與學生〉一文，指責北京大學生風氣頹靡墮落，「多數只是困在飲食男女上」，「戀愛失歡又時常成了問題，此問題比天壓下來力量還要大」。

立之後，有錢人紛紛遷往南方，故市區空出了許多房子，房東便將院落隔成小間，專門安排租給上京的窮學生居住¹³。沈從文形容他所租賃的公寓內部，空間十分狹窄惡劣：

掌櫃的把這個貯煤間加以改造，臨時開個窗口，縱橫釘上四根細木條，用高麗紙糊好，擱上一個小小寫作桌，裝上一扇舊門，讓我這麼一個體重不到一百磅的鄉下佬住下。¹⁴

他將之號為「窄而霉小齋」，從此，這一名稱便在他的作品中頻繁出現。公寓雖然「窄而霉小」，但比起「會館」，卻是充滿了青年人不羈的活力，在這裡，沈從文結識到了無數好友，如農業大學、燕京大學和北大學生；更有一些與他背景相似、從外地而來的北大旁聽生，如丁玲和胡也頻。沈從文記述第一次拜訪丁玲，便是在她寄租的「通豐公寓」中，一樣是「窄而霉小」，牆上貼滿破爛的報紙，他甚至感到吃驚，一個女孩怎麼能夠住在這樣惡劣的房子裡，「不害病，不頭痛，還能從容的坐在一個小小的條桌邊寫字、看書？」¹⁵但不管現實生活再怎樣困窘，透過沈從文的回憶文字，我們仍然可以得知在這一段「公寓」歲月中，他和一群離鄉背井的青年們如何相濡以沫，締造友情，乃至於一番「後五四世代」的文學大業。

這些青年所寄居的「公寓」，多是沿著北京故宮東牆邊上的北河沿一帶，環繞著北大來開展。¹⁶沈從文曾經讚嘆：「以紅樓為中心，幾十個大小公寓，所形成的活潑文化學術空氣，不僅國內少有，即在北京別

¹³ 見沈從文，〈我到北京怎麼生活學習〉，《沈從文文集》第十六卷，頁215-222。

¹⁴ 見沈從文，〈憶翔鶴〉，《沈從文全集》第十二卷，頁252。

¹⁵ 見沈從文，〈記胡也頻〉，《沈從文全集》第十三卷，頁7。

¹⁶ 如今因北京城市街道規劃變異頗大，昔日胡同和老建築亦多拆除，故公寓確切地點考察不易，只能約莫指出方位或某一區域如紅樓、沙灘附近。而相關地圖繪製亦相當不易，需更多文獻資料進行考證，而二〇年代北京「公寓」與現代文學關係之研究仍屬起步階段，過去少人注意，也期待更多學者能投入相關研究。

的學校也希見。」故從1919年五四運動到1928年左右，十年之內，在此間「公寓」所造就的文學社群，不僅稱得上是二十世紀初年大學、文壇與青年之間，互動最為緊密的一段時期，也可說是北大最有活力的黃金年代。從西城的「會館」到東城的「公寓」，無疑揭示了二〇年代知識份子生活重心的轉移、遷徙，以及昔日以科舉為代表的舊時代結束，而由五四運動所創造的、以大學為中心的新一代文人的崛起。並且還不止於此，我們更可以從中窺見知識份子形象的轉換：昔日是風塵僕僕上京趕考的書生，和一群同鄉文人閉鎖在「會館」之中，苦讀經典，爾後默默無聞地老去、死去；但到了1920年代以後，卻是一批寄居於「公寓」之中的青年們，來自於四面八方，三教九流，他們不見得具有學生身份，但因彼時北大採取門戶開放的政策，而特有一相當自由、鬆散的旁聽制度，故這些青年寓居在大學周邊，和學子打成一片。大學無法提供現實的保障，他們的前途因此多是開放的、混沌未知的，充滿了迷惘與不確定感；但這也造就了他們波西米亞的氣質，多半著迷於無政府主義，崇尚清談，嗜讀西方浪漫派的小說，譬如丁玲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事實上，這些青年們的生活狀態乃至於彼時的北京城，確實正是處在一種「無政府」狀態之中，而「浪人」——此乃沈從文在〈致唯剛先生〉一文中的自稱，卻也同時可以成為這一群波西米亞人的代名詞。

如果說，在三〇年代的上海，咖啡廳是一個文人聚會，亦即最具有潛力發展成為哈貝瑪斯（Habermas）所言「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的所在¹⁷，那麼在二〇年代的北京，北大周邊的「公寓」則儼然就是文

¹⁷ 如李歐梵，《上海摩登》（香港：牛津出版社，2000）頁18-23指出，親法的文人如曾樸，刻意把上海咖啡廳營造成為法國的沙龍，「而中國的親法份子是否成功地把他們的文學沙龍變成了哈貝瑪斯（Habermas）所謂的「公共空間」還是存疑的。但上海的作家把咖啡館當作朋友聚會的場所卻是無疑的。從當時記載和日後的回憶看來，這種法國慣例加上英國的下午茶風俗在當時成了他們最重要的日常儀式。」。

人們彼此相見、相聚，以致行為和思想交相激盪，甚至共同夢想要編纂雜誌、報刊以發聲的核心場域。¹⁸故對於這些青年「浪人」而言，「公寓」顯然是一個寄寓情感、投射認同的對象，其重要性還要超過了他們當初一心嚮往的北大。值得玩味的是，在沈從文的北京書寫中，我們也幾乎找不到關於北大的描寫，就算有，頂多止於躲在圖書館中翻閱報刊、以避寒冬罷了；至於他著墨用力最深的，仍然是「公寓」，彷彿是把它當成了一個大學生活的「轉喻」(metonymy)——將整體化約成為部分，而透過此類的化約，方才能夠使原先推定係存於現象世界幕後之大群的行動人與行動機構，得以浮現於現象之中¹⁹。1926年，沈從文出版個人生涯的第一本小說，便將其命名為《公寓中》，而集中的作品也多在描述公寓生活，由此可知這裡正是他感受北京這一座都市的起點。他們不但熱衷於書寫公寓，在實際的日常生活中，最大的樂趣也是在北河沿、沙灘一帶閒晃，四處看公寓房子，夢想著要從一處搬到另外一處，或者是一時衝動，下了租屋的訂金，卻又後悔²⁰。但不管如何，他們對於「公寓」內部空間強烈的窺探慾、好奇和幻想，皆已流露無遺，而這些「公寓」也在有形無形之中，打造起他們日後的人際網絡，並且成為一扇開向美好未來的窗口。

在沈從文陸續住過的許多公寓中，從銀閘、沙灘到北河沿等等，「漢園」應該是其中最為特殊的一棟。「漢園」的屋主是一位愛好文藝的雅

¹⁸ 如郁達夫第一次見到沈從文，就是親自到他的公寓中登門拜訪。而胡也頻主編《民眾文藝》時，是最早登出沈從文作品的刊物，他也是數度親自到沈從文的公寓「窄而霉小齋」拜訪，日後更在公寓中一起夢想編輯刊物。見沈從文，〈記胡也頻〉，《沈從文全集》第十三卷，頁3-48。

¹⁹ 參見海登·懷特，《史元》上冊（臺北：麥田出版社，1999），頁36-38對於史著詮釋筆法之一「轉喻」的說明。

²⁰ 見沈從文，〈記丁玲〉，《沈從文全集》第十三卷，頁95-103，描寫他們如何熱愛公寓生活，住過許多地方如「銀閘」、北河沿、「孟家大院」、「漢花園公寓」等等。

士，許多新文學作家如張采真、焦菊隱、王魯彥、蹇先艾等等，都曾經是「漢園」的房客，而卞之琳、何其芳也在稍晚住過此地，兩人還因此合出了一本詩集《漢園集》（1936）。至於沈從文、丁玲和胡也頻的「漢園」歲月，更是牽扯出了一段現代文學史上三人是否同居的著名公案²¹。凡此種種皆可以看出，「公寓」在1920年後北京文化圈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它取代了以「故鄉」作為傳統人際樞紐的「會館」，而形成「後五四世代」的新興社群和文藝團體，並且從中摩塑出一批氣質迥異於前的青年「浪人」來。

三、野性與魔性

1925年，沈從文在〈致唯剛先生〉一文中自嘲自己的小說是「一個高小沒有畢業的浪人作品」，並且對於大學生「以改良社會為己任」、「談政治，討論婦女解放」的使命感，語多嘲諷：

「淒清，頹喪，無聊，失望，煩惱，」當然不是那些立志改良社會，有作有為，尊嚴偉大，最高學府未來學者的應有事情。²²

但我們從中卻不難看出，沈從文與五四時期以人道主義為口號的「人的文學」的差異。在現代文學史上，1917年至1927年大多被畫為同一時期，而標題為：「五四文學」，不過若仔細探究，譬如以沈從文的例子看來，從五四運動到他初入北京之間，雖然只有相隔短短的四、五年，但政治和社會環境卻已然出現了曲折變化，而不宜再將它們統一起來看待。自從1917年孫逸仙在廣州成立「軍政府」後，北京政府的勢力便日趨衰弱，輪流遭到皖系、直系、奉系軍人把持：1923年直系軍人曹錕賄選，出任

²¹ 見沈從文〈記胡也頻〉（《沈從文全集》第十三卷，頁14-16）對於「漢園」的記述，以為「這個公寓的主人，真是一個趣人」。

²² 見沈從文，〈致唯剛先生〉，《沈從文文集》第十一卷，頁40。

總統，1924年南方「國民政府」成立，孫逸仙便聯合各系軍人討直，1925年段祺瑞又復執政，不久被驅逐，北京又轉而落入奉系張作霖的掌控之中。在軍閥相互傾軋的情況下，大學的紀律也隨之鬆弛不振，不過，大學生人數卻不減反增²³，使得僧多粥少的局面更形窘迫，譬如1921年，北京大學薪餉就長達數月未發，造成了廣大師生的積怨。學生運動雖然依舊頻繁，但相形之下，在1915到1920年間的學生運動，多是以「反日」為主要訴求；而到了1921到1926年間，卻變成大部分是為了教育或內政為主，譬如1925年學運共發生了48次，其中44次皆是與學校的內部行政有關²⁴，五四運動所高喊的救國口號或科學、民主等理想，則已被實際的社會民生議題所取代了。故相形之下，二〇年代後北京總體的局勢恐怕是比先前來得更加晦暗，混沌不明，而思想的箝制也更加嚴峻。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包圍虐殺請願的大學生，被魯迅沈痛地指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而宣布「『請願』的事，從此可以停止了。」²⁵於是內政的沈痾，經濟的困窘，軍閥黑手伸入大學校園，再加上連年戰亂，大量外地窮學生湧入北京，情形正如郁達夫所描述的：走到大街，「不上半天，就可以積起一大堆什麼學士，什麼博士來」。然而人浮於事，學位也不見得管用，唯有攀附權貴，靠走後門以求得一官半職，方才是青年人唯一的活路。²⁶

軍閥勤於內鬥，疏於治理，嚴重的失業問題，遂成為沈從文來到北京之後面臨的第一個絕境。對此，沈從文似乎忿忿不平，當年五四運動

²³ 據統計1916年大專學生人數為17241人，而1925年學生則增加兩倍之多，為36321人。見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臺北：聯經出版社，1998），頁137。

²⁴ 同前註，頁142-144。

²⁵ 見魯迅〈無花的薔薇（之二）〉、〈「死地」〉和〈紀念劉和珍君〉等文，載於楊澤編《魯迅散文選》（臺北：洪範出版社，1994）之中。

²⁶ 見郁達夫，〈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晨報副刊》，1924年11月16日。

的支持者多離開學校，「離開了真誠，離開了熱情，變成為世故，為阿諛」，北京只剩下滿地蕭瑟，北大也已放棄了昔日進取精神，「而把精力向音韻訓詁小學考據方面去發展」，故「大學一與文運分離，也不免難得保守、退化、無生氣、無朝氣」²⁷。當他走投無路之際，只好寫信向郁達夫求援，郁達夫親自到「窄而霉小齋」中拜訪，但最後仍然寫了一封信給他，勸他放棄求學的美夢，乾脆把自己的心腸練得硬一點，去做「賊」算了。這一看似侮辱人格的建議，在彼時卻是蘊含深意——既然在上位者竊國，中位者竊自黎民百姓，故一切人的財產皆為贓物，那麼復從他人之處取來，又有何不可呢？故從「浪人」到「賊」，沈從文所勾勒出來的是一個基本生存發生危機，導致國家、道德、人倫秩序皆在快速崩毀之中的北京。街頭上到處都是乞丐，偷、拐、搶、騙、賴帳等無恥之事充斥在都市的每一角落，而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創造社」的頹廢浪漫文風盛行，也是一樁可以理解、甚至理所當然之事了。沈從文指出，在1925年前後的北京，影響力最大的刊物是《語絲》，最風行的文學團體是「創造社」，而在青年人心中「『郁達夫式的悲哀』成為一個時髦的感覺」。²⁸至於「文學研究會」的現實主義或「人道主義」的使命，則彷彿變得較為沈寂了，如同沈從文所言：

當時正是「文學研究會」的莊嚴人生文學，被「創造社」的浪漫頹廢作品所壓倒，北京一隅的空氣，已開始被悠閒小紳士們所提倡的幽默趣味文學支配，南方革命尚局局於廣東，上海地方還無徵兆可言，一般現象皆轉入消沈時節。²⁹

²⁷ 見沈從文〈文運的重建〉（《沈從文全集》第十二卷，頁81-82）指出五四以後文運與教育分離的狀況，以及〈在湖南吉首大學的講演〉（《沈從文全集》第十二卷，頁392-401）一文。

²⁸ 見沈從文〈論中國創作小說〉（《沈從文全集》第十六卷，頁195-222）及〈記胡也頻〉（《沈從文全集》第十三卷，頁3-48）二文中皆提及《語絲》的影響最大。

²⁹ 見沈從文，〈記丁玲〉，《沈從文全集》第十三卷，頁81。

故他認為是郁達夫、郭沫若和張資平，而不是魯迅，對於日後的中國創作者影響尤其巨大³⁰。而其中，沈從文又特別推許郁達夫，認為若和魯迅相比，魯迅的憂鬱是來自於中國農村的，但郁達夫的憂鬱卻是真正貼近青年人的內心：

作者所長是那種自白的誠懇，雖不免誇張，卻毫不矜持，又能處置文字，運用詞藻，在作品上那種神經質的人格，混合美惡，揉雜愛憎，不完全處，缺憾處，乃反而正是給人十分尊敬處。……魯迅使人憂鬱，是客觀的寫到中國小都市的一切，郁達夫，只會寫他本身，但那卻是我們青年人自己。³¹

而這種帶有濃厚主觀色彩、自由表達感覺與感性、或敘述個人經歷傾向的文風，也可以看出明顯受到日本私小說和歐洲浪漫主義的影響。由此可知，在創作的一開始，沈從文便走上了一條不同於先前五四時期「文學研究會」之「感時憂國」的歧路——沈關注的焦點只在自身，而且比起郁達夫還要更極端。在個人生命最為焦躁的時刻，郁達夫還試圖反映出中華兒女的集體悲劇，發出「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強起來吧」的沈痛國族輓歌。故在1930年之後，郁達夫在左翼社會革命和小資產階級的個人道路中間，來回擺盪掙扎，³²但對於沈從文來說，他卻始終是一路堅持自己「個人」的美學觀，而未曾更改。換言之，沈從文稱得上是中國現代小說道路上的最後一個浪漫主義者——他只相信所謂的美、愛以及抽象的感官，而除了主觀的心靈之外，其餘

³⁰ 見沈從文，〈郁達夫、張資平及其影響〉，《沈從文文集》第十六卷，頁187-194。他並從郁達夫和張資平二人，去討論五四運動以後文學風潮的演變。

³¹ 沈從文，〈論中國創作小說〉，《沈從文文集》第十六卷，頁208。

³² 如郁達夫坦承「左翼作家大同盟，不錯，我是發起人中的一個。可是，共產黨方面對我很不滿意，說我的作品是個人主義的。……可是社會這樣東西，究竟是不是由無數『個人』組織而成的？假定確實也是這麼一回事，那我相信暴露個人的生活，也就是代表暴露這社會中某一階級的生活。」引自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頁136。

外在的價值體系皆可以受到懷疑，也皆是虛幻。

也因此，沈從文偏好以一己的感受，亦即透過一位離鄉背井、孤獨無依的都市「漫遊者」，來一一呈現出北京的人事和街景。此一「漫遊者」——在小說中有時是第一人稱的「我」，有時則是虛構的第三人稱，其實都形同是沈從文自我的投射——行走街頭，沒有特地目的，眼光也游移不定，任意又隨性地捕捉偶然乍現的光影。沈從文筆下的「漫遊者」似非是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言資本主義時代中波特萊爾式的遊手好閒者，因為他既不從容悠閒，也不客觀疏離，³³反倒是一個寂寞、焦慮又緊張不安的「我」，縮擠在街道的邊緣，急於想要介入這座都市，卻又往往不得其門而入；但當「我」想要轉身而逃時，卻又發現原來已經無所遁逃於天地間。在沈從文小說之中的主人翁，自始至終都是這一座大都市的「他者」，而不是一個自在又自得的主人。³⁴

³³ 在班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中定義「漫遊者」為「遊手好閒者」，他超然又疏離地注視著他們身邊的世界。但顯然類似此種超然又疏離的漫遊姿態，鮮少出現在上海的書寫中，見李歐梵，《上海摩登》，頁36-43的討論。

³⁴ 董玥，〈國家視角與本土文化——民國文學中的北京〉，載於王德威、陳平原編，《北京：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北京：北京大學，2005），頁249指出：在上海知識份子會有做「他者」的感覺，在北京他們則不會，因為在北京他們是主人，而北京的本地人才是他們眼中的「他者」。故董玥結論說：北京城中的「新知識份子」並不是像班雅明眼中的波特萊爾那樣的漫遊者，或城市閒人，因為他們不是人群中的詩人，他們甚至根本就不在人群中。換言之，班雅明「漫遊者」的理論是否適用在北京或上海的書寫中，值得商榷。李歐梵《上海摩登》之中，以班雅明的「城市和遊手好閒者」去討論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都市書寫，而指出：「一個新的，不斷商品化的都市，『一個布滿大街，咖啡館，汽車，妓院，遊樂場，還有最重要的來自人群和遊手好閒者的安慰的世界』，成了自波特萊爾以來的法國先鋒派的描述對象；而且它也為『現代主義的黎明』準備了最基本的條件。」然而，李歐梵比較了三〇年代中國上海作家的都市漫遊，卻和班雅明的「漫遊者」不同，而「波特萊爾式的對現代性的悖論反應並不一定能被上海的那些『摩登』作家認同，因為他們似乎很沈醉於都市的聲光電影而不能作出超然的反思。」換言之，班

譬如以沈從文寫於1928年左右的〈一件心的罪孽〉、〈老實人〉、〈怯漢〉和〈誘拒〉四篇小說為例，寫法如出一轍，皆是以一位男子在北京的四處漫遊，跟蹤陌生女子，然後透過尾隨的軌跡，揣摩出都市的點點滴滴。我們也可以由此勾勒出一幅屬於沈從文的北京地圖，那便是：沿著長安大街從東城來到西單牌樓一帶，以及北海公園和中央公園。趙園曾在《北京：城與人》一書中指出，寫北京的小說不少，卻殊乏「京味」，如沈從文便是其中之一；而新文學史上寫北京的小說，也往往沈湎於古城悠然的日常節奏，而冷落了現代的北京變貌（頁15、207）。但其實不然，沈從文再三描述1920、30年代的北京，而其「京味」也正是在突破傳統的旗人社群，而生動地捕捉外來流浪人口的形象，以及各種物質、商品和肉體的誘惑力，可以說是極少數以小說來呈現現代北京的先驅者之一。他也特別喜歡描寫西單牌樓、菜市場和商店街（如眼鏡公司、洋貨店、老鋪、茶葉店、零食店、糖果鋪……），以及躲在胡同深處的妓女戶。而不管是食物（糖炒栗子、醬肘子、油雞、奶油餅、寇寇糖……）、小玩意兒（如泥小豬、松花……），或是行走在大街上的女人，皆彷彿充滿了致命的威脅與吸引力。故在北京這一座街頭的商品博覽會前，沈從文並沒有體驗到上海都市的異域情調，沒有對資本主義的義憤填膺，更沒有所謂戀物、拜物或是被馴服的危機，他純粹就是置身在一個充滿了活生生享樂氣息的世界中，為之著迷，又羨又嫉，：

他承認這些是生在世界上應享受，應留戀，還可說是應玩賞的事物，尤其是單把濃嚴的香味跑進他鼻孔而本身卻懸掛到玻璃櫥中的燒雞燻鵝。這些東西使他腿軟，使他腹鳴，使他由失望而憎惡而

雅明的「漫遊者」概念是不宜全然移植到中國的都市書寫之中，因為社會情境和現代化的時程和腳步之截然不同，而這也就是李歐梵所謂的「中國的現代性問題」。

傷心。³⁵

……

我就是為了看看這活的又愉快的世界的全體而生活的吧。或者是，我是為集中與證明「羨企」、「妒恨」一些字典上所有字的意義而生活的吧。³⁶

小說中的北京城更像一場喬治·巴塔耶（Bataile）所說的「誇富宴」（pot-latch），它排除了所有的交易，而其目的是在詆毀對手，使之蒙羞；而欲望帶有強行超越、侵犯某種被禁止東西的激烈度，也把一度被嫌惡的、畏懼的狂暴之力重新帶回來。³⁷而誘惑既在眼前，卻又遙不可得，一切便在瞬間轉化成了羞辱的經驗。譬如〈絕食以後〉描寫「我」身無分文，徘徊在西單牌樓的熱鬧大街上，但就連店家櫥窗懸掛的燒雞、燻鵝，看來也都充滿了莫名的驕矜和敵意：

這些沒有生命了的東西還也來驕傲人！其實有生命的人與無生命的物，同樣不能對誰某驕矜，只要你自己去設法就可接近它，佔有它，吞滅它。³⁸

這是一個物與物相食的世界，達爾文進化論「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實驗場，道德失靈，禮教崩毀，只剩下原始慾望流淌在「魔鬼的人群」和「地獄的事物」中間。故〈公寓中〉描寫「我」走在北京街頭，惶惶不安，看到女人身上的衣飾，皆認為是「因性的交換從對方得來的」；而賣煤油的老翁主動要借給「我」錢，也被「我」懷疑是別有所圖，無情地加以拒絕。如今看來，五四時代所吶喊的「禮教吃人」、「打倒孔

³⁵ 見沈從文，〈絕食以後〉，《沈從文全集》第一卷，頁361-362。

³⁶ 見沈從文，〈怯漢〉，《沈從文全集》第二卷，頁199。

³⁷ 見喬治·巴塔耶（Bataile），〈耗費的觀念〉，載於汪民安編譯，《色情、耗費與普遍經濟——喬治·巴塔耶文選》（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頁31。以及湯淺博雄，《消盡——巴塔耶》（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七章。

³⁸ 見沈從文，〈絕食以後〉，《沈從文全集》第一卷，頁362。

家店」等口號，皆顯得過份高尚了——因為除了食色的慾望、宣洩的暴力、過度消耗、精神錯亂、驚疑不定，以及一連串對於女性肉體：乳房、手、頸、腿乃至香氣的焦躁垂涎之外，在這座慾望的都市中，「禮教」或「孔家店」恐怕都早已宣告失效。

四、原欲：酷語、色語、穢語

沈從文不僅鄙視堂而皇之的國族論述、革命語言以及「尊嚴偉大」的知識，在二十世紀初年，正值女權意識高漲之際，他甚至也大膽唱起反調，認為「天生一個女人最大的義務，就只是把身體收拾得很美」：

女人身上發出的香味芬馥。我心想，是這樣，就正是在鼓勵男子向上的一種工作！這本身，這給男子的興奮，就是詩，就是藝術，就是真理！女人就應作女人的事，女人的事是穿繡花的衣裙，是燙髮，是打扮……一面求知識，一面求美麗，真是女子一種要緊的訓條。³⁹

他更挖苦道，正是因為「從前男人歡喜女人裹腳，於是有小腳。如今則男人歡喜女人讀書認字，於是女人就都入大學唸書了。」⁴⁰而這種論點在左翼革命者的眼中看來，自然是相當保守、反動的了，故沈從文小說中對於女體大量的窺視、意淫、甚至毫無忌憚的挑釁，也導致他日後被批評成為是一個「桃紅色的異端」。⁴¹關於這些批評，我們並不能視之為是「空穴來風」，或是惡意的抹黑，不過，露骨的情慾描寫，也不必

³⁹ 見沈從文，〈一件心的罪孽〉，《沈從文全集》第二卷，頁109。

⁴⁰ 見沈從文，〈不死日記〉，《沈從文全集》第三卷，頁419

⁴¹ 關於沈從文的批評，應以郭沫若，〈斥反動文藝〉，載於王珞編，《沈從文評說八十年》（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2），頁265-272一文殺傷力最強，批評沈從文是「桃紅」，「作文字上的裸體化，甚至寫文字上的春宮」，是「一直有意識的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

然就是一種輕薄，或是褻瀆。在〈第二個狒狒〉中沈從文引《聖經》〈雅歌〉所言：

一群裹在粉紅水綠絲綢裡的美麗肉體從橋上過去了…呵呵，你妖豔的肉體啊！為甚如此美麗？你用你像鴿子的眼睛來宰割一切不幸的人。⁴²

人類潛意識深處的魔性和野性，所孕育出來一股帶有毀滅性的美，或許才正是沈從文認為生命的終極價值所在，故他再三言之，而樂此不疲。誠如金介甫（Kinkley, Jeffery）所一再強調的，沈從文小說具有哲學深度，尤其是受到佛洛伊德象徵派的影響。⁴³確然，從他熱衷於描寫性、原欲與夢，並且從中發揮各式奇想，便可以窺知沈從文重視主觀心理的抽象層面，要遠超過客觀的社會現實分析，而他也以為小說的目的，便在於：「使一個人消極的從肉體愛憎取予，理解人的神性和魔性，如何相互為緣，並明白生命各種型式，擴大到個人生活經驗之外，為任何書籍所無從企及」。⁴⁴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沈從文並不像張愛玲或是新感覺派作家一般，經常挪用心理分析如戀父、戀母或變態等理論，去詮解人的「神性」和「魔性」；他反倒是要從「肉體愛憎取予」和「生活經驗」之中去翻轉出小說創作的真正核心：「美」，並且進一步指出「美」乃是不落入言詮，單憑直觀體驗，而當下立見。故就這個層面而言，沈從文終究還是奠基在東方的傳統思維之上，而把「美」視成是一種生命實踐的過程。

在〈主婦〉中，沈從文便如此定義「美」：「美是不固定無界線的

⁴² 見沈從文，〈第二個狒狒〉，《沈從文全集》第一卷，頁373

⁴³ 見金介甫（Jeffery C. Kinkley）著，符家欽譯，《沈從文史詩》（臺北：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頁385-386及350-354，強調沈從文當時讀過佛洛伊德之書，故小說中頗多心理學影響痕跡。

⁴⁴ 見沈從文，〈短篇小說〉，《沈從文文集》第十六卷，頁494。

名詞，凡事凡物對一個人能夠激起情緒引起驚訝感到舒服就是美。」⁴⁵故「美」就是激發感受，回到原欲，其中自然有純美可喜之事，但也同時包含了桀傲不馴的野性，甚至是陰鬱幽暗的魔性。故「美」一方面自我完成；一方面卻也可能是自我的毀滅。沈從文以獻身給魔鬼的「浮士德」自比，他相信：

文學藝術只有美和不美。精衛啣石，杜鵑啼血，情真事不真，並不妨事。……

這個廣大的世界，尚有許多形體、顏色、聲音、氣味，都可以刺激你過份靈敏的官覺，使你變得真正十分年青。⁴⁶

「精衛啣石」、「杜鵑啼血」，皆是要以自身的血肉作為「美」的犧牲獻祭。故沈從文一再地鑽入北京黑暗隱蔽的角落：胡同深處、公寓房間，甚至公園、大街上的人群之中，試圖勾引出潛藏其內的野性與魔性，以開出罪惡的華朵，而此乃屬於人性之自然，美麗與殘酷同時並存。如此一來，在他小說中所構築出來的北京圖景，竟也是處處充滿了大自然的意象，與上海——一座霓虹閃爍、摩天高樓林立的人造之都，有了截然不同的風光。〈老實人〉中的男主角自寬君在北海公園裡，跟蹤一位女人的腳步，最後不知不覺登上公園的高處，放眼望去，北京竟是被一片綠海所包覆：

望全京城煙樹，全是綠蔭的北京城真太偉大了，而這每又正是一種蕭條的沈靜的美，合乎自寬君認為美的條款。⁴⁷

於是一樁看似登徒子的輕薄行為，卻因為大自然「蕭條的沈靜的美」，與自寬君內在原欲的流動相互結合，遂展現出一種天真又率直的氣味。故沈從文筆下的北京，時時點染樹木、風、雲等大自然的元素，而他也以為北京之所以特別令人歡喜，便是在於它的「野氣」：

⁴⁵ 見沈從文，〈主婦〉，《沈從文全集》第九卷，頁358。

⁴⁶ 見沈從文，〈水云〉，《沈從文全集》第十二卷，頁128。

⁴⁷ 見沈從文，〈老實人〉《沈從文全集》第二卷，頁92。

你同別的人歡喜北平不同。別人以為北平一切是舊的，一切皆可愛。你必定以為北平罩在頭上那塊天，踏在腳下那片地，四面八方捲起黃塵的那陣風，一些無邊無記那種雪，莫不帶點兒野氣。你是個有野性的人，故歡喜它，是不是？⁴⁸

歌頌「野性」和「魔性」的沈從文，從來不排斥下流暴力——公寓中的「浪人」沈浸在手淫和自殺的幻想之中，最後用身上僅存的幾個銅板，去交換一個小妓女的吻⁴⁹，但他可決不會像都市人所流行的戀愛一樣：「愛了就謙卑諂媚，裝模作樣」，「只是一群鬪雞似的男子，各處扮演著丑角喜劇」（〈如蕤〉，頁338-9）。故在〈怯漢〉中他跟蹤一位就讀師範的女學生，甚至以暴力惡言相向，要待她像「暗娼」一樣：

是的，你回頭吧，我正要你不愉快，你們這類人使我心痛時太多，你們這些人，平常就只會收拾得像朵花樣子，來故意誘起中年可憐的男子的悲哀，今日可輸到你頭上了。我願意我能更無聊一點，更大膽一點，待你們像暗娼，追逐你們的身後，一直到你住處！⁵⁰

即使自己被罵作是「痞子」，也不在乎，因為不論「痞子」或「浪人」，都正是沈從文在介入這一座野性之都時，所標舉出來的鮮明姿態。

這種獨特的姿態，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借用朱大可所提出的「流氓主義」來說明之。朱大可認為「流氓」乃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而所謂的「流氓主義」就是指在身份危機的語境之中，以異鄉情結、焦慮心態和反叛立場作為精神特徵的流氓意識型態。它更可以推而廣之，向上追溯到古代的游俠主義，而向下延伸到當代的街痞主義、犬儒主義和厚黑主義等各種樣式。至於「流氓話語」的典型特徵，則是「含有大量酷語、色語和穢語，並以所謂『反諷話語』體系對抗國家主義的

⁴⁸ 見沈從文，〈如蕤〉，《沈從文全集》第七卷，頁345。

⁴⁹ 詳見沈從文〈公寓中〉（《沈從文全集》第一卷，頁351-359）的描寫。

⁵⁰ 見沈從文，〈怯漢〉，《沈從文全集》第二卷，頁200。

『正論話語』體系。」⁵¹換言之，由沈從文所自稱的「浪人」、「痞子」，也就是相當於「流氓」，所衍伸出來的各種色情、意淫、偷窺等等話語，正是他對於「宏大論述」(grand narrative)的一種叛逆、瓦解與逃脫。而沈從文亦非常自覺地在小說中運用「反諷話語」，除了屢屢拿來自嘲之外，在〈松子君〉中他更是把五四運動「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挪用成為熱戀情人的喃喃嚶語：

我的俠義心，博愛心，犧牲心，尤其是對女人神樣的熱誠的愛情，在衙屬辦公桌上消失的，惟有在她面前，就立即可以找回。……打倒那老浪子擁有女人的帝國主義！這口號，我將時時刻刻來低聲的喊。打倒呵，打倒呵。⁵²

革命語言被諧擬成為愛的宣言，這不禁消解了「正論話語」的義正嚴詞，也巧妙地以各種「酷語」、「色語」和「穢語」來戳穿國族主義的慷慨激昂。

頗堪玩味的是，此類「反諷話語」只有出現在沈從文以北京為題材的都市小說中，但當他在描寫湘西鄉土時，卻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改出之以一種抒情、典雅、又詩意盎然的牧歌筆調。何以會有此種差別呢？而這又是否在暗示：當沈從文置身北京之時，所必然感受到的國家體制「正論話語」的壓力，故才會在自覺或是不自覺中要起而反抗之？至於他所身處的1920年代的北京，不也正是國家——馮玉祥攻入紫禁城，溥儀被逼出宮，一次又一次的軍閥鬧劇，已把「中華民國」的正當性摧毀，以及儒家傳統的「正論話語」，均業已失去效力的時刻嗎？在沈從文的回憶之中，孫中山已經變成了人民口中的「孫大砲」，因為他的建國主張全都是「一些不切實際的空話」；而北京最大快人心的戲劇性事件，居然是馮玉祥攻入京城時，抓到了曹琨的面首，凡此種種，無

⁵¹ 見朱大可《流氓的盛宴——當代中國的流氓敘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對於「流氓話語」的定義，頁15。

⁵² 見沈從文，〈松子君〉，《沈從文全集》第一卷，頁297。

疑再度說明了在體制分崩離析的時刻，宏大論述消亡，故只剩下各種流言小道、竊竊私語，在街巷人群之間流竄著。所以沈從文的「浪人」姿態和充滿「反諷話語」的北京書寫，是否也恰好呼應了彼時中國荒謬的現實狀況？

五、結語

普實克（Jaroslav Prusek）指出，五四時期中國現代文學之所以突出個人主義和主觀主義，乃是因為對於存在充滿了悲劇性的感受，以及自我毀滅的傾向；而此一傾向乃在清代就已經萌芽，那也正是中國封建制度逐步在走向潰散、瓦解的徵兆。⁵³故如此一來，沈從文北京書寫中所展現的「浪人」、「痞子」姿態，乃至小說中挪用的「流氓話語」，是否也說明了當國家已不再是凝聚信仰的對象，而精神所依附的儒家道德體系，更面臨摧枯拉朽的危機時，這一批「後五四世代」青年所陷入的，恐怕是比起五四時期更加虛無黯淡的現實環境？1926年，段祺瑞開槍打死示威學生，1927年李大釗被政府處以絞刑，「公寓」之中巡警一再突如其來的逮捕、搜索，以及青年學子莫名奇妙地失蹤，⁵⁴或是自殺，或是病死，都令沈從文不禁感慨：

雖活在一個四處是擾擾人聲的地方，卻等於蟲豸，甚至於不如蟲豸。要奮鬥，終將為這個無情的社會所戰敗，到頭是死亡，視同許多人一樣自己用一個簡單方法來結束自己。⁵⁵

而他的青年朋友們竟也多不得善終，被悼念者有胡也頻（〈記胡也頻〉）、

⁵³ 見雅羅斯拉夫·普實克（Jaroslav Prusek），李燕喬等譯，〈中國文學中的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普實克中國現代文學論文集》（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頁3。

⁵⁴ 見沈從文〈回憶黃村生〉（《沈從文全集》第二十七卷，頁418-428）中對於1925年前後，北京京師警察廳入學生宿舍逮捕的描寫。

⁵⁵ 見沈從文，〈生存〉，《沈從文全集》第三卷，頁433。

叔遠（〈船上岸上〉）、犧牲於抗日戰爭中的表弟聶長榮（〈生存〉），以及遭國民黨軟禁、被他誤以為已死的丁玲（《記丁玲》）……，彷彿只有剩下自己孤伶伶一人是這世界的倖存者。故沈從文一生堅持與政治保持疏離的態度，大概也是緣由於此，死亡與倖存，竟成為了「後五四世代」的宿命和印記。

沈從文從現代五的北京入手，在那一間「窄而霉」的「公寓」之中，經歷了原欲在現實中的躁動不安，而將渴求「美」的幻念投射回他的故鄉——那一偏遠而落後的湘西，為它蒙上了一層淒迷的、夢境一般的虹暈，直到最後，他在琉璃廠和故宮——古老帝國文明的餘暉中，找到了結合「現實」與「幻念」的「美」，他的生命才從此不再搖擺。正如段義孚《逃避主義》所言：「人們逃避的是真實，逃向的是幻想」，而人們逃向的是一種文化，「這也意味著逃離了生活中陳腐和混沌，逃向一種更清澄的生活，並且為生活披上了一種神秘的色彩」。⁵⁶故沈從文並非是把「野性」注入到中國這個古老的文明裡，⁵⁷恰恰相反，他其實是「逃向」中國古老的文明，並以此注入到人類的原欲、野性和魔性之中，以修飾掉那粗礪面。而這「逃向」更像是一趟漫長的、自我修練的內向旅程：沈從文從1910年代的小兵、1920年代的「浪人」，到逐漸變成1930年代以後的「京派」學者、唯美的文人，乃至於1949年後的文物考古學家，他其實是一步步去除了生命中粗糙、殘酷與焦躁，而調和了內在「神性」和「魔性」的衝突，以達到最後的和諧與寧靜，並以此作為身處在二十世紀亂世中一個孤獨之人的終極救贖。

⁵⁶ 見段義孚著，周尚意、張春梅譯，《逃避主義》（臺北：立緒文化，2006），頁29。

⁵⁷ 如蘇雪林〈沈從文論〉，載於王瑤編，《沈從文評說八十年》（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2），頁182-193，指出：沈「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蠻人的血液注射到老邁龍鍾頹廢腐敗的中國民族身體去使他興奮起來」，故「他把『雄強』、『獷悍』整天掛在嘴邊。」

On Shen Congwen's Beijing Writing

Yu-Hsiang Hao*

Abstract

Since Shen Congwen's literary works thematize heavily on both the urban and the provincial areas, it may not be unfair to remark that "the urban" and "the provincial" become what Shen's Janus-like feature is made of: the polarity and pairing of two faces and two voices in one person. This paper will study the way Beijing stirs and helps invent Shen's "Xiang-Xi imaginary" by probing into Shen's life and writing during his Beijing period. Upon his first arrival in Beijing, Shen found his stay at the "guildhall" only to move afterwards into the "apartment" near the beach of the Peking University. This movement symbolizes the image change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the 1920s: a scholar in guildhall turns into a wanderer (or even a vagabond) in an apartment. Seriously affected by the bankruptcy of national order and moral integrity in Beijing under warlords' regime, Shen's "Beijing writing," while replete with anarchistic tones, has its language use in the detached, the dirty, and the erotic revolving around orexis, lust, love's overconsumption, and spiritual agitation, thus questioning the self-sufficiency of the nation-state discourse. What Shen intends is none other than the search for beauty in people's sickened hearts and raging libido. Only by overlapping this pursuit with the Xiang Xi homeland in Shen's memory can Shen find a way to alleviate his anxiety for reality. In the final analysis, we may argue that only in the Beijing as is founded on a profound tradition of an old empire can Shen find the beauty that will put reality and

*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illusion in balance. And Shen has little hesitation in taking this beauty to be an ultimate way of redeeming a 20th-century individualist.

Keywords: Beijing, urban writing, Shen Congwen, modern fiction, Xiang

xi